

辞章

与

技巧

89级汉语系

文基莲

辞章与技巧

人民日报出版社

辞 章 与 技 巧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丹东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frac{5}{8}$ 字数：248千

1985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2次印刷

社目：137—12

书号：7132·012 定价：1.90元

目 录

司马迁的人物特写.....	冯其庸 (1)
春秋笔法.....	振甫 (37)
从孟子的辩论文学习写作技巧.....	振甫 (53)
韩愈散文的技巧.....	振甫 (73)
柳宗元的散文.....	振甫 (95)
欧阳修散文的特色.....	振甫 (117)
短小精悍 议论风生	
——介绍刘基《郁离子》中的议论文.....	徐凌云 (133)
从《聊斋志异》中学习写作的技巧.....	杨柳 (143)
晚清散文写作方法漫谈.....	张毕来 (153)
梁启超的时评.....	王芸生 (170)
学习鲁迅杂文的表现方法.....	林志浩 (176)
鲁迅散文中真实人物的描写.....	林志浩 (193)
于平淡中见神奇	
——谈朱自清的散文.....	朱德熙 (202)
夹叙夹议和夹喻夹议.....	振甫 (211)
立意四题	
——学习古代文论札记.....	钟翔 (219)
文章的开头和结尾.....	冯其庸 (230)
取舍·组织·加工	
——《通鉴》编写一例.....	振甫 (241)

论证的方法

——读古代论文札记……………郑国铨(249)

论说文的谋篇布局

——读古代论文札记……………郑国铨(256)

服之以理 动之以情

——论说文学习札记……………章丽阜(265)

从古典文学中学习“简练”的技巧……………冯其庸(273)

略谈鲁迅运用语言的艺术……………郑成训(283)

从鲁迅手稿中学习锤炼语言……………徐仲华(293)

从古代作品中看用词的正确、简练、生动……………许威汉(299)

物虽胡越 合则肝胆

——古代学者谈比喻……………卫 志(309)

不觉其虚 弥觉其妙

——古代学者谈夸饰……………卫 志(317)

意则期多 字惟求少

——古代学者谈精练……………卫 志(323)

文言文中的省略……………许威汉(332)

文言虚字小谈……………许威汉(341)

当你读古代作品的时候

——谈学习辨别词义……………许威汉(349)

学习郭沫若同志的一篇短文……………曹述敬(356)

从“新诗改罢自长吟”说起……………冯其庸(360)

典故·注释·字典……………赵彦卓(363)

司马迁的人物特写

冯其庸

特写，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被我国的读者和作家们认识和运用，虽然时间还不很久，但是如果根据特写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从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的宝库中仔细鉴别一下，我们自然会发现这种文学形式，很早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们认为我国先秦的历史文学著作如：《左传》、《国语》、《国策》中的某些篇章，已经具有某些特写的因素，那末，汉代杰出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便是一部具有显著的特写特色的巨著。《史记》中的许多人物传记（包括“本纪”和“世家”在内），可以说是古代杰出的人物特写。

一、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细节描写

司马迁是一位卓越的语言艺术家，在他的人物特写里，他十分成功地运用了精炼的语言，塑造了众多的具有性格特征的艺术形象。他十分善于运用准确有力的笔触，描绘人物具有特征性的行动。他的这种技巧，仿佛那些卓越的画家们所运用的白描的手法，通过简洁有力而富有表现力的线条，

勾勒出一个个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画像。高尔基曾经用“画”和“描”这两个动词，来说明特写和其他文艺体裁的区别；他所说的“画”，正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白描和勾勒，而司马迁的这种艺术方法也正是一般人物特写所共有的艺术特征。这里，我们且看一看下面这两段描写：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

.....

后三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

也。

长于治军而又猿臂善射，勇冠三军，因而被匈奴人称为“汉之飞将军”的名将李广，在这里被司马迁用简洁而精炼的笔墨，雕塑得栩栩如生，神采四射。然而司马迁在这里并没有对人物的眉毛、眼睛、头发、手脚、衣服等等作细致的描写，他善于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人物具体的行动来塑造形象。例如在上述一段文字里，作者描写李广，主要是突出了他的治军的才能。不论在什么样的危急情况下，他的士兵都能听他的指挥，毫不动摇；其次是描写了他卓越的智谋、胆量和勇气以及他惊人的箭法。司马迁在这短短的篇幅里，十分精采地刻画了这个“才气无双”的李将军的这些过人的才能，因此也就象画龙点睛一样，他笔下的人物，自然就破壁飞去了。

我们再读一读下面《屈原贾生列传》里的这段文字：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

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楚怀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庸无能而又贪得无厌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司马迁在这里同样是抓住了这个人物最富有特征性的行动，进行了深刻的刻画：他听信谗言疏远屈原而亲近小人，他贪得商于之地六百里而不顾信义与齐断绝邦交，他在受人愚弄以后又凭一时之怒轻易出兵，终至丧师、失地、辱国，秦国既因迫于事势而愿归还楚国的失地，他又偏偏不要失地而要索取张仪来报他受欺之仇，张仪既已索来而他又听信了宠姬郑袖的话将张仪轻易放走，张仪既已放走而因为屈原的谏诤他又顿时追悔不及，立刻派人去追捕张仪。……通过这一切具有特征性的行动，司马迁活画出了一个昏庸无能的楚怀王。我们将这一段文字与前面描写李将军的一段文字对读一下，可以清楚地看到，同样是通过人物本身具有特征性的行动来进行人物的刻画，但由于作者掌握了不同人物的不同的本质特征，因而能够从各种不同的方面突出地刻画了人物的形象。而作者对他们的褒贬的态度，也就十分明确。

特写作家，首先需要通过对人物的具有特征性的行动的描写，来刻画人物，这样才能用最精练的笔触，最经济的篇幅来及时地反映这些人物的精神风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特写作家可以不必注意人物的细节，或者人物特写中不必有细节的描写。这样理解，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一方面希望人物特写中能出现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另方面我们也要求这些人物形象，同时具有较为丰富的精神境界。因此对于人物

具有特征性的行动的刻画和细节的描写，这两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正是由于如此，特写中的人物的精神风貌，才能体现得更为丰满。司马迁在自己的人物特写中，由于选择了许多具有深刻意义的细节来作为对这些人物描写的补充，因而他的人物们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活动就格外显得饱满，有生气。我们且看一看司马迁在《高祖本纪》和《张丞相列传》里的这几个细节描写：

沛中豪杰吏闻（沛县）令有重（贵）客（到），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管收礼金和招待客人），令诸大夫（指招待员）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给为谒（在名片上假写）曰：“贺万钱！”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满不在乎）。

这一个细节描写，深刻而生动地揭露了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在未发迹时的流氓无赖行径。而且这种性格特征，一直贯穿在他毕生的行动中，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两个细节描写：

（周）昌尝燕（晏）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主也！”于是上笑之。①

*

*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我）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老二）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前一个细节，司马迁从刘邦的个人生活中，深刻地揭露了这

① 着重点是笔者所加，下同。

个人物的精神面貌：刘邦骑在周昌脖子上这个君臣之间一问一答的细节，十分深刻而生动地揭露了这两个人的原形。周昌原是刘邦未发迹时的无赖群中的一个，对于过去的一切，他们互相是心照不宣的。在满朝的大臣面前他们可以一本正经，但到了人背后，他们便可毫无顾忌地原形毕露了。后一个细节，司马迁深刻地描写了刘邦在做了皇帝以后的得意忘形的神态，在字里行间，充满着那种心满意足，志得意骄的情绪。我们再看一看下面《陈涉世家》里的这一个细节描写：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通过这一细节描写，作者深刻地揭示了陈涉对于现实强烈的不满情绪，向读者宣泄了他的内心世界，这样就显得陈涉后来伟大的反抗行动，并不是偶然的。司马迁正是通过了这些具有深刻意义的细节描写，使得人物隐蔽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能够生动地展现出来，从而使他笔下的人物，具有丰富多采的姿态，而且作者对于这些人物的爱憎，也由于这些细节的描写而更加明确。

二、对人物或事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评论

高尔基曾经说过：“特写是介乎研究性论文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种作品。”这当然是指现代特写而言的。这句话，除了说明特写与短篇小说有某些共同之点（如人物描写，情节结构等等）外，还明确地指出了特写本身的特色，这就是

鲜明的评论性。任何文学作品，总是对生活的反映，因此也就是对生活的评价。然而一般的文学作品，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对生活进行评价的，作者不以自己的身份、口气向读者直接评论作品中的人物或事件。例如我们在前面曾指出，司马迁往往通过突出人物的某些具有特征性的行动或细节，来对人物进行褒贬。这种对生活或人物评价的方法，基本上是文学艺术共同的方法。然而特写除了运用这种方法以外，还容许作者对人物或事件进行直接的评论，而且这种评论，成为特写文学的特色。

司马迁的人物特写，是具有鲜明的评论性的，而且其评论的手法，也是富有独创精神和多样化的。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他所独创的传末评论的方法。司马迁在每篇人物特写的后面，总是附上一段“太史公曰”的评语，以表明自己对所写人物的态度。然而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里，又极尽了文章变化腾挪的能事，使他的传末评论，非但没有破坏文章艺术上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而且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性。司马迁在传末评论里，爱憎是十分鲜明的，表现了他的卓越的见解，而且他的传末评论的方法，也是富有变化的。他善于根据人物不同的特点来进行评论，例如在评论项羽的时候，一方面指出了项羽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说：

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

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垄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这里指出了项羽在秦末豪杰蜂起的混乱局面下，竟将“五诸

侯灭秦”，将残暴的专制统治的秦朝推翻，这确实是件大事，对历史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这里表现了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卓识。但司马迁也并不因此而讳言项羽的根本错误，他接着又说：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虽然项羽的根本错误，在于他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完全是违背人民统一愿望的反动路线，致使他覆亡的根本原因，是他没有一个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的政治理想，而主要的并不完全是由于“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然而司马迁能够锐利地指出他“背关怀楚”，“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一味地迷信武力，不承认政治的作用，而且“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这不能不承认司马迁的这种评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卓越的。对于项羽，司马迁抓住了他性格特征中刚愎自用，死不觉悟的这些悲剧性的特点，进行了评论。我们再看看他对淮阴侯韩信的评论：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统一），乃谋畔（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这里同样指出了韩信对于刘邦统一天下的不朽功绩，但又十分尖锐地抨击了韩信不顾人民死活，在天下已经安定统一的局面下，还企图分裂天下的军事野心。司马迁的这种政治观和历史观，无疑是进步的。司马迁的传末评论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再看一看他对“才气无双”而一生坎坷不遇的季广

的评论：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乡下人），口不能道辞（不会花言巧语）；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李广是一位值得同情的人物，司马迁曾亲见过他，所以在这段文字里，又补充描写了他的正直、质朴、忠实等优良的品质，同时又通过广大人民对李广的哀悼，来表示作者对这位英雄的崇敬和悼念。在语言的风格上，也充满着低徊恳挚之情调。我们再看看他对孔子的评论：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是封建社会里的“圣人”，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伦理各方面确实起过异常伟大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在写这段论赞的时候，是怀着异常崇敬的心情的，所以上来就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样最高的赞语，接着就写自己读孔氏书、适鲁、观仲尼庙堂等等的具体感受，来抒发自己对这个人物的无限向往，然后再用天下君王贤人来与他相比，指出他们都不如孔子影响的深远。我们将这段评语用来和李将军的一段评语相比，便可看到同样是表达作者自己敬仰颂赞的评语，却因为所写的人物不同，所以评语也各不相同，但又都做到了恰如其分。我们再看看司马迁对另一类人物如窦婴、田蚡、灌夫的评价：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策而名显。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武安负责而好权，杯酒贵望（怨），陷彼两贤（人），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

《魏其武安侯列传》是写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矛盾的一篇出色的人物特写。处于矛盾尖锐的是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这两人都是外戚。另外还有一个纠缠在这个矛盾中的灌夫，这是一个民愤极大而在政治上已经失势的大官僚恶霸。所以司马迁在评论这三个人时，都投以轻蔑鄙视的语调，说魏其、武安都是外戚，魏其是靠吴楚之乱的机会爬上来的，武安则是依靠了王太后及武帝而贵幸起来的。灌夫则是靠镇压吴楚之乱时拼了一回命才被重用的，换句话说，这三个人都不是因为有真正的才能而被重用。魏其与灌夫相交，两个都是失势的人，一个是不甘心自己的失势，另一个更是“无术而不逊”，所以酿成了祸乱。而武安呢？也不是好东西，因为与灌夫杯酒之间的意气之争，竟不择手段，把灌夫连窦婴都陷害处死了，而最后，自己也暴病而死。所以司马迁连连叹息说：“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最后一句话，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自取其祸呵！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司马迁所用的一种与前面《李将军列传》、《孔子世家》等完全不同的语气的评语。

司马迁的传末评论的手法，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不可能一一拿来分析。总之，司马迁在这里充分发挥了他的独创性，借着这一节文字，既帮助他的作品提高了思想性，同时

又在艺术上保持了与整个作品的完整统一。我们研究司马迁的传末评论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我们今天的特写，也要照样画葫芦。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他的独创性，而不要被某种固定的形式所束缚；要根据内容的需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形式。我们的时代，是充满着新鲜生活、新鲜思想的时代，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创造出适合于新内容的新形式出来。

司马迁人物特写的评论性，除了上述这种早为人们所注意的传末评论的形式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在传中夹评即夹叙夹议的方法。例如《屈原贾生列传》中，在“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以下，就加了这样一大段评论：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这样一大段深情激荡的文字，虽然作者并没有象传末评论那样加上“太史公曰”四个字，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司马迁所加的评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并没有害怕加了这样一段文字而使他的人物传记在艺术上受到损

害，相反，正是由于这样一段精辟的评论，更表彰了屈原崇高伟大、光明磊落的人格。我们再看一看《伯夷列传》里的这段话：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犹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在这一大段愤激不平的文字里，司马迁干脆明确地写出了“余甚惑焉”的句子来，那就更清楚地说明了这是他对现实的评论。司马迁在这里对封建社会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种麻醉人民反抗意识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尖锐的抨击，对于社会黑暗的现状，更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揭露。正是由于这种尖锐的评论，使得他的人物特写，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人民性。

司马迁除了运用这种传中夹评的方式外，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进行对另一人物的评论。例如《汲郑列传》里写憯直的汲黯评论汉武帝说：

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②黯对曰：“陛

② 荀悦《汉记》卷十《孝武皇帝纪一》记此事说：“帝问汲黯曰：‘吾欲兴政治、法尧、舜，如何？’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如何欲效尧、舜之治乎！’上大怒。这里是把武帝的几句话省略掉了。